

第一章 绪论

本书论述的是云南上古文化史。那么，什么是文化？所谓的文化，就是在人类社会，人们共同体以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知识总汇。它具有历史性、传统性、民族性和阶级性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历史上各个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民族和阶级，才创造出光辉灿烂、异彩纷呈的文化来。它们是那样的千姿百态，各具特色，又闪耀着人类共同智慧的火花，把世界协调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是文化的魅力！

云南上古文化，就是世界文化绚丽百花园中一支溢光流彩、香飘四海的奇葩！

一、云南文化的内涵

云南，是一块古老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不但培育了众多的山川河流，也诞生了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有重要影响的古人类。正是人类的先祖，首先创造了云南的古老文化，并随着人类早期的迁徙和繁衍，凭借着古老的水陆通道，将古云南文化辐射到亚洲的许多地区。

云南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多彩，就历史纵向而言，至少可以包括古代文化、当代文化、民族文化和企业文化等；就历史的横向而言，至少应该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部类；就文化层次而言，可包括大雅文化、通俗文化和传统文化；就文化特质而言，它包括本土文化、外来文化和混合文化诸种，如此等等，不

一而足。就内容而言，文化当包含民族、民俗、服饰、饮食、起居、婚丧、建筑、兵器、典章、制度、医药、科技、宗法、舆地、法制、教育、名胜、学术、文献、伦理、礼仪、宗教、考古、文学、艺术等众多学科和门类。因而，当今世界上的专家学者们，曾对“文化”一词下了 200 多个定义，作出了各种各样的概括和论述，但至今仍没有一个能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其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便可想而知了，它几乎包括了人类创造的所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笔者在本文里，所说的云南文化就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言。但要论及它的各个方面似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在这里，仅就决定精神文化和对云南文明、中华文明乃至对世界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古人类文化、稻米文化、青铜文化、衣饰文化、建筑文化和交通文化等六个方面为代表的物质文化作一简要的概述。作为云南古代颇具代表性的典型文化，它曾对祖国丰富多彩的文化宝库作出过基础性的重要贡献，同时也决定了云南在全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这就是云南文化的主要内涵。现分别简述如下：

（一）古人类文化

最早的古人类发祥于何地？这是说明创造远古文化的关键前提，因为没有古人类，就不可能创造远古文化。文化是靠人来创造的。关于人类的起源地问题，中外人类学家多有歧见，有的认为在东非，^①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在云南的滇中高原。^②我们知道，人类起源于古猿。地球史上第四纪，是人类的产生和发展时期。原始群大致处在第四纪的早更新世、中更新世两个阶段。人类学家普遍认为：人科中最早的一个属是腊玛古猿，“是人类的前驱”^③即“人类的直系祖先”，^④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步进入人类社会的门槛。

先看“东非人”。1959 年，英国学者路易斯·利基首先在非

洲坦桑尼亚奥杜韦峡谷发现了“东非人”的头骨化石和石器。地质属早更新世，其年代测定为距今 175 万年，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后经许多科学家鉴定，改称为南方古猿鲍氏种。^⑥1960 至 1961 年，在同一层又发现了形态上更像人的“能人”化石，地质年代距今约 190 万年。^⑦

在中国云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多次发现了古猿与古人类化石。其中，云南西瓦古猿“可能是猿类的祖先”。^⑧1956 至 1957 年在开远小龙潭先后发现 10 颗腊玛古猿化石，时代定为中新世晚期，年代距今约 1400 万年前。^⑨1975 至 1976 年，在禄丰上新世的地层中又发现了腊玛古猿化石，年代距今约 800 万年前。^⑩1987 年在元谋发现众多的蝴蝶腊玛古猿化石，年代距今约 300 至 400 万年。同年在元谋又发现“东方人”的牙齿化石，“时代为晚上新世晚期，估计距今 250 万年。”^⑪而早在 1965 年在元谋上那蚌村就发现了著名的“元谋人”牙齿化石，其地质年代为早更新世晚期，绝对年代距今已有 170 万年左右。^⑫在元谋人化石土地还发现了一些石器，^⑬还有用火的痕迹，这是我国至今为止发现的较早人类。现在，我们仅就云南发现的古猿和古人类化石来看，人类从灵长类向猿向人进化的脉络程序就比较清楚了：一般灵长类—云南西瓦古猿—开远腊玛古猿（距今约 1400 万年）—禄丰腊玛古猿（距今约 800 万年）—蝴蝶腊玛古猿（距今约 300 至 400 万年）—东方人（距今约 250 万年）—元谋人（距今约 170 万年）。这一切雄辩地证明：中国云南高原很可能是世界人类的起源地和古人类的重要文化区。^⑭发端于滇中高原的古人类可凭借长江、珠江、澜沧江、怒江及北方的“藏彝走廊”等水陆通道分别向我国西北、东南和东南亚、南亚各地辐射、扩散，将古人类及其所创造的远古文化，传播到西亚、北非及欧洲大陆。

（二）稻米文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现象，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⑧也就是说，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⑨物质文化是创造精神文化的基础，在人类的远古时代，离开了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物质生产，就无从谈论和创造人类的其他精神文化。

云南创造了悠久的稻米文化。据农学家研究，世界稻谷栽培主要集中在亚洲。栽培面积虽然只占世界粮食作物面积的 1/4，却供给全球近 3/4 的人口作为主食，其在饮食文化中所占的特殊而显赫的地位便不言而喻了。

人类最早的亚洲稻生长在哪里？谁最早开始栽培和驯化？这是几十年来，农学家和考古学家所热衷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现在我们根据有关材料进行论证。

据我国古代文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古代之黑水，即今天的金沙江。金沙江河谷以及滇中元谋等县，气候炎热湿润，沃野千里，自古都是夷越之民耕作之地，因有“百谷自生”的优越条件，经人工驯化栽培，才“爰有膏菽膏稻”的。在云南，除金沙江流域外，野生稻及经驯化栽培的原生稻分布很广。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云南昆明、元谋、剑川、普洱等地发掘，相继出土了不少古稻种，经碳 14 测定，宾川白羊村出土的古稻种，距今大约 4000 年左右；普洱凤阳出土的古稻种，不晚于 2000 年前。^⑩

近年来，日本等国学者为了探明世界栽培稻的起源地，曾到云南西双版纳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他们在思茅至景洪途中和景洪师范学校内都发现了亚洲普通野生稻。在允景洪郊外曼景兰水田周围，发现了普通野生稻群落。此外，在普洱、元江等县也曾先后发现了不少野生稻。根据以上材料，日本著名学者渡部忠世得出结论说：“至于西双版纳是否是亚洲栽培稻起源的中心，现在谁都不可能明确地回答，然而至少是在非常遥远的古代，作为云南一部分的西双版纳即已从事着稻作农业，这一点，可以说是几乎没什么疑问了。”^⑭关于西双版纳傣族先民在远古时代就驯化和栽培野生稻的情况，在傣族史籍《帕萨坦》和《巴塔麻嘎捧尚罗》等里都作了详细生动的描述。鉴于此，许多学者认为云南的傣族是最早从事稻作文化的民族，云南是亚洲乃至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稻米饮食问题的解决，为云南远古物质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青铜文化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青铜冶炼和使用，在生产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人类从蒙昧、野蛮的石器时代向青铜工具的文明时代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据目前所知的考古发掘资料，我国最早的青铜文化是河南偃师二里头的早商遗址，出土了铸、凿、刀、锥等包括生产工具、兵器和容（礼）器的青铜器，时间大约是公元前 15 世纪。^⑮

云南的青铜文化，在我国青铜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以独特的地方民族风格，精湛的冶炼工艺和生动美观的表现形式而著称于世，为中外学者所瞩目。云南丰富的铜、锡等有色金属矿藏，是其发展、繁荣的优越条件；特殊的地理位置，是青铜文化丰富多彩的重要根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剑川海门口、楚雄万家坝等云南

50 多个县 160 多个地点进行发掘，共发现了青铜时代文物 11000 余件，其中 9000 多件是青铜器。经初步研究认为，“云南青铜文化起源于公元前 12 世纪之前”^①，即我国商代中期。可划分为“滇池区域青铜文化”即“滇文化”^②和“滇西青铜文化”^③两个类型。其主要特点是，青铜器种类繁多，已使用到生产、生活、战争等各个领域；青铜器铸造的历史悠久，文饰古朴典雅，充分反映了当时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云南的青铜器已引起了中外许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尤其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云南的铜鼓，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关于铜鼓的研究，西方学者已进行了近 3 个世纪，但始终未能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建国以来的考古发掘说明，云南铜鼓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东南亚和世界铜鼓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975 年，在楚雄万家坝发掘出了 5 面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铜鼓。出土时，有 4 面铜鼓都是面朝下，底朝天倒放着，通身都有黑色烟炱。这些铜鼓在形状上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鼓有很大差别，花纹简单，式样原始古朴。从倒置和烟熏的痕迹看，“显然曾用来煮过食物，说明还处在既作乐器又作炊具属铜鼓发展初级阶段”^④。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出土 4 面铜鼓的 23 号墓，年代是公元前 690 ± 90 年（距今 2640 ± 90 年）。这个年代比世界上现在所知道的任何一具铜鼓的年代都早^⑤。这说明，云南是铜鼓的起源地。在全国发掘出的 60 余面铜鼓中，云南就占了 37 面，有伴出物的铜鼓居全国之冠。而且云南铜鼓有较完整的发展序列，距今 2700 年到 100 多年的铜鼓都基本具备，可清晰看出铜鼓发展演变的脉络和向外传播的路线。云南以铜鼓为代表的古老而众多的青铜器文化，是推动云南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文化。

（四）衣饰文化

衣饰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一个显著特征。原始人类从何时开始穿衣饰物？最初穿戴衣服是为了御寒？还是为了遮羞？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这在中外学术界多有歧见。然而有一点却是明确的，即在秦汉以前，中原内地的汉民族多穿戴丝麻织品，四周的少数民族，则披羽毛皮衣。《礼记·王制》云：“东方曰夷，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西方曰戎，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礼记·礼运》又说：“昔者先王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治其麻丝，以为布帛。”《白氏帖》云：“伏羲作布”，许多学者认为此为传说，不足为据。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江南地区考古发掘说明，丝和麻都是吴越地区的越人首先创制的。^④

然而，作为制作衣服最重要最普遍的棉花、棉织品和棉织衣服最早出现在何地呢？这还得从记载云南史事的历史文献里寻找答案。《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哀牢夷皆穿鼻僮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彩文绣，罽毼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韵会》注：“罽，都括切，蛮夷织毛罽也。”所谓“帛叠”，《外国传》〔李注〕曰：“诸属国女子织作白叠花布。”所谓梧桐木华布，就是木棉花布。《广志》〔李注〕曰：“梧桐有白者，罽国有机木，其华（花）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绩织以为布。”《华阳国志》也说：“梧桐木，其花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污，俗名曰桐华布。”

上述文献记载说明，远在秦汉以前，中原还未出现棉织品的时候，云南滇西地区的傣族等先民，就早已采摘木棉花（又名攀枝花）纺纱织布，作为制作衣裙的主要原料了。同时也养殖桑蚕

织丝，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商品，一是传入中原内地，二是与剌国（现缅甸）、身毒国（现印度）进行贸易交往。东汉时，非洲棉经过我国新疆地区才逐步传入中土；亚洲棉，原产印度，也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逐渐传入云南和我国其他地区的。由此可见，云南的衣饰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占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对云南文化的发展也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有史籍记载的客观事实。

（五）建筑文化

在人类的物质文化中，衣食住行是最基本的文化构成。而且从人类的童年开始，就有了原始的住所了。“因为住所不但是人们夜间休息的地方，也是防御野兽侵袭、保护火种和进行炊事的场所”。^④从人类的进化史看，最初生活在大森林里，从事采集和狩猎活动，为防野兽的侵害而主要居住在树上或岩洞，即史籍称之为的所谓“洞居”和“巢居”。随后才逐步进入草原平坝，从事随畜牧业及定居后的早期农耕生活。与此相适应，居住也逐步发展为穴居和进而简易屋居，因而，“洞居”和“巢居”当是人类最早的居住形式。《隋书·南蛮传》云：古代南蛮“随山洞而居，古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文身”。《太平御览》卷 78 引项峻《始学篇》：“上古皆穴居，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居，古之遗俗也。”这里所说的“巢居”，实际已指竹楼式的干栏了。

干栏是云南最古老的建筑形式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剑川海门口遗址中，就留下了干栏建筑的遗迹。遗址位于剑湖之滨。建筑遗迹保存下来大量木柱，共发现 224 根，直柱是下端削尖插入土中，有的上端有凿孔，还有一些横梁两端保留枝叉。“显然，这里原是一处柱上房屋（干栏）的遗存。由于柱子的分布略成一条不很整齐的直线，其间又不能区分明显的房间，它很可能原是

一处‘干栏’式‘长房’，即供原始氏族或大家族集体居住的大型建筑。”^④此类建筑较多，只因木质干栏易腐坏无法久远保留而已。关于干栏的史料记载甚多，《韩非子·五蠹》云：“构木为巢以避群（兽）害。”《魏书·僚》言：“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后世称为“干栏”和“竹楼”。李思聪在《百夷传》中详述了傣族的居室：“公廨与民居无异，虽宣慰府亦楼房数十而已。制甚鄙猥，以草覆之，无陶瓦之设，头目小民，皆以竹为楼。”在云南，除傣族世居干栏式竹楼外，尚有布朗、佤、基诺、独龙等民族皆居干栏式房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独龙族还保留一保“树屋”，即依山搭树而居，可谓远古居俗的原始保留。

在云南，穴居式建筑也甚为源远流长。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考古学者在洱海西岩佛顶、马龙、龙泉、白云四个遗址进行发掘，在天然溪流旁分布有半穴居房屋、火塘和窖穴。掘出圆形或方形之坑，即以坑壁为墙，上覆草为顶。火塘旁伴有“锅庄石”、木炭屑及陶片^⑤。这种半穴居房屋，后来逐步演变为彝、哈尼、拉祜等民族喜居的“平顶屋”。

以上材料说明，由于云南是人类的重要发祥地，因而从远古时代起，居于这里的原始人群为了避寒遮雨，防野兽的侵害，就创造了巢居干栏式和穴居平屋式为主的居住建筑形式，为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六）交通文化

交通是人类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的一个重要条件。我国古代的交通分陆路和水路两个方面，使用的交通工具，据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载：“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撵。”但主要的交通工具则是车和船，即所谓“南船北马”。道路是交通的先决条件，早在 4000 多年前，我们的华夏祖先就在中原修

筑了道路。夏、商、西周的道路主要是横向发展，即主要开拓东西向的车行大道。直至春秋时期，地处南方的吴、越、楚等国先后强盛起来，欲称雄中原，才修筑南北通道，开始向纵向发展。这样，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和交流，起着巨大的作用。

云南的交通文化，又独具特色。云南地处云贵高原，人类学家称为康滇古陆。这里北连青藏高原，东邻华中盆地，南接东南亚沿海。境内有南北蜿蜒的横断山脉，其间奔腾着众多的江河，山势高耸，地形复杂，这为云南的交通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和特异的内涵。这里既无法修筑中原的平坦大道，也不便使用一般的车船交通工具。

然而，就是在这地形复杂、山高林密的边陲云南，谁敢相信，早在公元前 4 世纪，不但修筑了云南通往四川及中原的交通要道即“五尺道”，进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且修通了著名的“蜀身毒道”，即人们一般习惯称呼的“西南丝绸之路”。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云：“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蜀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这说明，早在秦汉以前，就开辟了从四川成都至云南通缅甸、印度的“蜀身毒道”。中国出口金、银、丝绸等物品，缅甸运来光珠（宝石）、虎魄（琥珀）、蚌珠（珍珠）、翡翠等物品，身毒（今印度）则运来琉璃、轲虫（海贝）等物。唐宋以后，又增加了由思茅地区的银生城（今景东）到今老挝、泰国、缅甸东南部的交通要道。据印度

史书《政事论》和《摩奴法典》记载，早在公元前 4 世纪，四川、云南的丝绸和茶已远销到印度，并通过印度转销到西亚、非洲和欧洲。^④这比张骞出使西域发现邛竹杖和蜀布，足足早了 200 多年，比著名的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早了数个世纪！

云南对外文化交流的另一条古老通道是顺着长江、珠江、澜沧江、怒江等江河水系进行的。远古时代原始人群和原始民族的自然迁徙大多也是沿着江河通道的。随着民族的迁徙，必然把云南的众多远古文化流传于四方。如有些中外学者经实地考察研究后指出，起源于云南的人工栽培稻，就是顺水陆远古通道，流传到东南亚和亚洲其他地方去的，“从遗传科学方面支持了云南是亚洲栽培稻起源的观点”^⑤。

云南通往国内外的数条水陆古道，其交通工具与中原内地的车与船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这里道路坎坷，崎岖不平，因而陆道上主要靠马帮，远古时代也使用过大象搞运输。水道由于江河湍急，制船水平低下，故远古时代多使用独木舟和竹筏，之后才逐步发展成载量较大、技术水平较高的木船运输工具。为了克服山高水急，交通阻碍的困难，自古以来云南各民族就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桥梁建筑，最古朴的有溜索、藤桥、竹桥、铁索桥等，后逐步发展成木桥、石板桥、石拱桥、风雨桥等大型永久性的桥梁建筑，为发展交通，繁荣云南的社会经济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云南文化的特点

云南文化有哪些文化主要的特点呢？著者归纳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云南文化是由云南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尚保留的各种社会形态，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社会发展史的生动画卷，具有重要的历史完整性。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全省东西横 864.9 公里，南北纵跨 990 公里，总面积 38.3 万多平方公里，居全国第八位。

云南是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总人口 1990 年为 3697 万人，全国 56 个民族，云南有 52 个民族成分，其中 5000 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有 25 个。人口为 1234 万人，占全省人口的 31.69%^③。在这些少数民族中，回、蒙古、满等民族，是 13 世纪元代在云南建立行省后才陆续迁入云南的，其他氏羌、百越、百濮三个族系的民族，在云南都有其悠久的历史。但由于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的众多原因，新中国成立前的云南少数民族，其社会形态呈现出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的画面。

基诺、独龙、佤族等民族，新中国成立前尚处于原始社会或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农村公社阶段。现仅以居于西双版纳基诺山区的基诺族为例，据笔者多次实地调查，新中国成立前的基诺族社会形态，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村社早期阶段，它是各种原生的公社形态中最后一个形态。其时的基诺族，虽然基本上形成了地缘联系为基础的共同体，但是其内部仍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氏族血缘关系纽带；虽然绝大多数个体家庭已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但是由于整个基诺族社会生产力水平仍十分低下，因而与此相适应普遍盛行着原始的伙耕伙种；虽然出现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剥削关系，但是在土地所有制中，以村社为单位的土地公有制还占有绝对优势，阶级分化不明显，尚未进入定型的阶级社会^④。与这种原始村社社会形态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也具有鲜明的原始特征。在其婚姻形态中还有较多的群婚残余，有些村寨甚至还保留着氏族内婚制。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提倡团结互助，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小到建房盖屋，全体动员，共同协作；大到反抗民族压迫，举行武装起义，都是上下一致，同心同德，全体抗敌。实行原始的军事民主制，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是平等的、和睦的，内部阶级分化不明显，阶级对抗不尖锐。在社会道德中，推行原始古朴的习惯法，人人具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原始道德情操，富有集体协作精神，私有观念淡漠，到处充满着与人为善的友好气氛。

云南小凉山的彝族，新中国成立前还处于奴隶制的社会发展阶段。小凉山位于滇西北今宁蒗彝族自治县及其毗邻的永胜、华坪等部分地区。小凉山彝族奴隶制的主要特点是：奴隶主和奴隶是两大对立的阶级，奴隶主占有稳固的统治地位，而奴隶则是被统治、被剥削、被奴役的主要对象。在这里，分为黑彝、曲诺（即百姓）、阿加（俗称分居奴或分家娃子）和呷西（俗称家奴或锅庄娃子）四个等级。黑彝是世袭贵族、奴隶主，只占总人口的4%；曲诺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属于一定的黑彝主子，有的曲诺在经济地位上已上升为奴隶主，拥有大片山林和部分奴隶，同时他们又隶属于黑彝主子并受黑彝的特权剥削；阿加虽受黑彝赐予一点土地自耕自食，但没有人身自由，其主要任务是为了繁殖奴隶而强迫单身奴隶配婚成家，其实质乃为奴隶身份；呷西是居住在主子家内的未婚奴隶，终年为主子从事繁重的家务或田间劳动，奴隶主有生杀予夺的权利。阿加和呷西两个奴隶阶层约占总人口的40%。上述四种等级均以血缘为准，永远不可逾越。在小凉山，这种以血统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是与彝族的父子连名制相联系的，因而小凉山的彝族奴隶制仍具有初期奴隶制的特点。与这种社会形态相联系，凉山的彝族社会的上层建筑和婚姻形态，无不打上奴隶制的烙印^②。

云南的傣族、藏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的还处于封建农奴制阶段，其中以西双版纳的傣族社会最为典型。西双版纳自元、明、清各封建王朝设置土司制度以来，沿袭至解放前，曾被中央王朝册封为“车里宣慰使”的“召片领”（意为“广大土地

之主”），世代成为西双版纳最高领主。在这里，一切土地皆属召片领所有，凡耕种领主土地的农奴，必须履行“吃田出负担”的规定。不耕种领主土地的成年人，也要“买水吃，买路走，买地住家”，按规定出一部分负担。甚至死了人要埋葬也必须向领主“买土盖脸”。这些都充分反映了领主大土地所有制的实质。这种大土地所有制，构成了西双版纳傣族封建领主制的全部社会基础。

西双版纳“召片领”之下辖 30 余“勐”（意为“一片地方”），每“勐”包括约两三千户，万余人。除景洪、勐罕两勐由召片领直辖外，其余各勐实权皆由“召勐”（意为“一片地方之主”）控制，即为各勐土司。无论领主集团或封建农奴，都有严格的自上而下的等级划分。领主集团划分为“孟”和“翁”两个等级，“孟”专指召片领及其嫡系亲属；“翁”指召片领的旁系亲属。领主集团约占总户数的 8%。在农民阶层中又分为三个等级：“滚很召”（意为“官家的人”，即领主家内奴隶）约占总农户的 39%；“傣勐”（意为“土著”）原为村社自由农民，逐步“封建化”为农奴，约占总农户的 55%；“召庄”（意为“官家的亲属”）约占总农户的 5%。各阶层以缴纳贡赋（或地租）和人身服役作为前提，其政治社会地位，则以土地多寡决定，并由此土地制度产生一系列的封建义务。西双版纳傣族领主制，其生产关系已进入封建社会早期阶段，但还保留众多奴隶制乃至原始农村公社的特征。^③

除以上几种社会形态外，在解放前的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如彝族大多数、白族、哈尼族、纳西族等都已先后进入封建地主经济阶段，其中居于洱海等地区的部分较为先进的白族和回族，已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一切都说明，解放前的云南各民族社会，已具有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社会形态，它宛如一

部活的社会发展史，生动具体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原生的社会文化也鲜明地反映出来，并具有重要的历史完整性。

在云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为何直至解放前还完整地保留着各种原生的社会形态呢？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云南这部活的社会发展史，必须成为人们认识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重要教科书。恩格斯评价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时说：“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并且在主要的特征上恢复了我们的成文历史底这种史前的基础。”^④研究云南民族史的意义也在于此，它给了我们一把洞察、揭开中外众多历史谜团的钥匙。

其二，云南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即具有其可贵的古朴性。

在拙文的第二部分较多的论证了云南物质文化颇为典型的六个方面，无论人类起源问题或其他方面，在我国文化史上堪称一绝，具有悠久的历史，对中华民族的远古文明乃至世界的人类文明，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学术界众多学者所公认的。

现在再来看看精神文化方面，也毫不逊色。就拿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的历法来说，其对中华古老文明的影响也颇为深远。我们知道，历法大体可分为三类，即阴历、阳历和阴阳合历。《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云：“圣人慎守明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历法是判别节气，记载时日，确定时间计算标准的方法，是对天文学的具体应用。因此，它对社会生产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以朔望月为单位的历法叫阴历。阴历是根据月亮圆缺的周期变化来制定的。现代，只有伊斯兰教国家和地区才通行这种历法，名为回历。以太阳年为单位的历法叫阳历。阳历把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定为一年，也就是把地球围绕太阳一圈的时间定为一年。目前全世界通用的历法叫公历，又叫格雷高里历，属于阳

历。既考虑到月亮运行的周期，又考虑了太阳运行的周期，这种历法叫阴阳合历。我国古代的历法就是阴阳合历，俗称“阴历”、“农历”。因为这种历法是从夏代开始使用的，所以又称作“夏历”，至今已有 4000 多年的历史了^②。

倘若未经实地考察和科学论证，谁敢相信，云南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历法，如傣历、彝族的十月历等。就十月历而言，据著名民族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彝族研究员刘尧汉先生论证认为：“其科学性优于现行公历，其历史悠久达万年以上。”^③彝族的十月历是怎么回事呢？它有什么特点？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教授在《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序》中作了精辟的总结。彝族十月历以十二属相轮回记日，3 个属相周为一个时段（月），即每个月 36 日。30 个属相周为一年，即 10 个月为 360 日，所余 5 至 6 日为“过年日”，习称“过十月年”。一年分为五季，分别以上、铜、水、木、火代表。一季为两个月，月分雌雄（阴阳）。单月为雄（公），双月为雌（母）。十月历以观测太阳运行定冬夏，以北斗柄指向定寒暑。大寒时附近过“十月年”，在大暑时附近过“火把节”，有些地区以大寒为岁首，有些地区以大暑为岁首，因地制宜。凡四年一闰为一个“八方年”，两闰为两个“八方年”周期。十月历介于 365 和 366 日之间，用传统“八方年”的纪年方法，使其密近于回归年 365.2422 日。其八方为大四方和小四方，彝族习俗多反映八方的概念。杨向奎教授指出：十月历“这规矩而整齐的历法，比我们应用的农历和通用的公历都方便、整齐，准确而便于记忆。它不仅有应用上的便利，而且用以比勘我们的传统文献，还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千载之谜。如《幼官图》中的‘五方十图’和‘三十个节气’，每相隔‘十二’而一个节的记载都可以了然。”了^④ 编者在该书的“内容提要”中说得更加明确并给予高度评价：“彝族十月历的

月、季分雌雄的阴阳观，是道、儒、墨、法、阴阳等诸子百家和医学、炼丹术的阴阳概念及现代电子计算机二进制数学的渊藪。中国古史中有些难题如《管子》的‘五方十图’，散见于经、史、子、集中的成数‘三十六’和‘七十二’等端赖彝族十月历给予揭秘。综合十月历两种观测方法的三层圆台金字塔型彝族向天坟，在世界考古天文学领域另具一格，有美洲玛雅金字塔与之类似。”

“彝族十月太阳历是中华民族远古先民的智慧结晶，是世界文明史上古优秀文化的典型。”^⑳而且云南许多氏羌族系的民族都曾使用过，它的文化光辉煌耀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其三，云南文化自古至今都能追根溯源，一脉相承，具有稳定的连续性。

文化，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生动反映，它具有稳定的连续性，即人们能够考察到文化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性。但由于种种原因，无论中外，历史上都发生了众多的文化断层，甚至成为历史谜团经久不解。如中国古籍《易经》所言的众多问题，世界史上“希腊及罗马的氏族一向成为所有历史学家之谜”^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摩尔根出版《古代社会》一书以前，人们对于人类婚姻形态发展的几个阶段是朦胧不清的。不少西方学者至今还持有种种歧见，重要的原因之一，他们不但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文献记载，更没有看到活生生的实例。但在云南这座民族文化宝库里，到处是俯首即拾的宝石。直到解放初期，都还较为完整地保留着各种原生的婚姻形态，它成了我们揭开若干历史谜团的钥匙。

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历过杂交群婚、血缘婚、对偶婚，单偶婚、一夫一妻制等主要的发展阶段。使人感到惊奇的是，上述人类婚姻发展阶段，几乎可以在云南民族史中找到它们的完整形态或遗迹。从人类学资料中我们得知，从猿向人进化的初期阶